

编者按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78篇,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为帮助大家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一重要思想丰富内涵、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本报联合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约请专家学者撰写系列学习体会文章,以供参考。共两部分,本版为第一部分。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 推动湖湘文化实现新发展

曹清燕 王家麟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较为系统地呈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的深邃思考和科学擘画,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怎样建设文化强国等重大问题,为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湖南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在传承历史文化、赓续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省域实践提供了丰厚土壤和生动样本。

坚持以文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聚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做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要在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更好把科学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更好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行动。”理论武装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显著优势,也是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要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途径,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全过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根固魂,以革命文化赓续红色血脉,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时代风尚,使党的创新理论在文化浸润中入脑入心。

坚持以文化人,在赓续血脉中厚植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凝结着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实践的基因和密码,是革命精神存续与传递的重要载体。湖南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红色文化在中国革命文化中具有标识性意义。保护好、弘扬好、发展好这些历经烽火留存下来的红色瑰宝,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深入挖掘和阐发其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创造性提出并阐述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科学方法,使我们党得以更加主动地把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思想引领、精神凝聚、价值感召和国际影响等方面前瞻性谋划和部署文化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巩固共同思想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风尚,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些系统谋划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转化为目标明确、层次清晰、相互衔接的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长远,统筹文化发展的战略主动。

坚持以文兴业,把握文化和科技融合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与科技相生相促”。这一重要论断,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文化观相统一的立场出发,揭示了文明演进

过程中技术进步与文化生产相互建构的内在规律。文化为科技赋魂,以价值导向规约技术方向;科技为文化赋能,以数字手段重塑生产传播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殷切嘱托“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要用好湖湘文化资源禀赋与数字技术比较优势,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化数字化趋势,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以文化创新激活资源,以科技创新重构链路,以产业融合放大价值,加快新型文化业态发展、传统文化业态升级,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更好发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作用。

坚持以文塑旅,擦亮湖南文旅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本质上是文化意义生产与旅游体验消费之间的结构性耦合。即静态遗产经符号编码转化为可感知的符号景观,物理空间被赋予叙事功能和情感价值,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进而实现文化意义从地方性存在向可体验、可流通、可再生产的跃升。湖南文旅图谱集自然地理、历史记忆、民族交往与红色基因于一体,应坚持全域统筹、错位发展,遵循差异化、特色化原则,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生态旅游、工业旅游,在完善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提升消费体验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使文旅融合成为扩内需、稳增长、促就业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文惠民,让公共文化服务可及可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当前,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高涨,文化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由“不够”转为“好不好”,公共文化服务由“有没有”转为“优不优”。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优质文化供给能力,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滋养人民精神世界、厚植人民精神力量。要深入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推动文化资源均衡配置、服务精准下沉,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使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面向“十五五”,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习近平文化文选》为科学指南,将文化建设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举措,在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上贡献湖南力量。

(作者分别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历史主动精神

陈龙 姚林志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位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出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这种历史主动精神,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精神特质之一,又为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作出了示范。

这种历史主动精神,体现在始终立足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历史方位,主动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积极回应中国之间、世界之间、人民之间、时代之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主动创造品格。一方面,认识来源于实践。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人们的认识,不管是对于自然界还是社会方面,“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另一方面,实践是充满矛盾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围绕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拓展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领域和理论视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境界,体现了主动探索文化发展新路的理论

勇气和实践自觉,彰显了推进文化理论创新的主动创造品格。

这种历史主动精神,体现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六个必须坚持”,坚持“两个结合”,科学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增强文化建设部署的战略主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创造性提出并阐述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科学方法,使我们党得以更加主动地把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思想引领、精神凝聚、价值感召和国际影响等方面前瞻性谋划和部署文化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巩固共同思想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风尚,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些系统谋划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转化为目标明确、层次清晰、相互衔接的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长远,统筹文化发展的战略主动。

这种历史主动精神,体现在始终恪守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要求我们党主动适应人民需求的新变化,不断提升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推动文化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不断赋予中华文明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形态,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与推动民族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机统一起来,这既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回应人民期待的历史主动,也彰显了主动破解文化建设时代课题的行动自觉。

这种历史主动精神,体现在始终扎根中华文明千年积淀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厚植文化发展根基,持续巩固文化主体性,主动开创中华文化传承发展新局面、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

文化。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历经沧桑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内在原因,为主动开创中华文化传承发展新局面夯实了思想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其中,“引向深入”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指向:在总体要求上,要守正创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在具体方法上,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文明在保持自身精神特质的同时,不断回应时代课题、满足现实需要;在理论追求上,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这三个方面互相支撑,共同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主动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主动开创中华文化传承发展新局面的历史主动精神。

(作者分别系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深挖方志资源 赋能文化强省

彭昊 侯文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湖南现存各类志书600余种,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方志编纂出版也始终走在前。这些志书系统记录三湘沿革变迁与人文风貌,构成湖南文化强省建设一笔独特而厚重的“底账”。如何让沉睡在书库中的志书转化为文化强省建设的活态资源,是需要回答的实践命题。

理论逻辑:方志何以承载文化主体性。文化强省建设的深层根基,在于地域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主体性不是抽象宣示,需要可征信、可传承、可反复阐释的文本载体来支撑。湖湘方志的特殊价值,正在于它以“一方之全史”的体例,系统辑录地方风物、人物与制度沿革,保存了连贯完整的地方集体记忆。与正史相比,方志的记述单元更贴近郡县乡里的日常治理与民生实态;与私修文献相比,方志的官修属性赋予其建制化的权威性、连续性的连续性。这种“官修—连续—地方性”三重特质的叠加,使方志成为建构地域文化主体性不可替代的文本基础——它让“本土文化从哪里来”有据可查,也让“往哪里去”有脉可循。

“第二个结合”进一步打开了方志资源进入当代实践的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

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湖湘方志秉持存史致用的实学传统,其经世取向、资政功能与关切民情的记录视角,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群众史观存在内在的亲性和。但这种亲和性不会自动转化为现实效能,方志资源要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地方文化滋养,关键在于找到一条从“文献存量”到“治理增量”的转化通道,而“第二个结合”就是打开通道的钥匙。

价值意蕴:从“可信文本”到“可用资源”。以志存史,厚植文化自信的史料根基。地方志的官方性与连续性,使其成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最朴素也最坚实的武器。湖南方志完整记录了从稻作文明到红色文化的地方发展脉络,留存了大量正史未载的基层史料。文化自信不是空泛的情感表态,它需要具体的地方知识来支撑:一个县的山川形胜、一个乡的民俗嬗变、一个家族的家风绵延,恰恰是“何以湖南”最贴近人心的答案。

以志资政,补足统计数据之外的历史维度。现代决策倚重统计数据,长于反映当下断面,短于呈现一个地方长期积累的治理逻辑与风险记忆。方志中的灾异记录、赋役沿革、水利兴废、物产变迁,提供的正是这种“长时段”的地方知识。比如,湘阴樟树港辣椒依托方志文献所载百年种植史,夯实地理标志品牌的历史

底蕴;益阳以乾隆时期《益阳县志》为明清古巷保护规划提供依据。实践表明,方志资政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品牌建设、城市更新、乡村规划中提供不可替代的史实锚点。

以志育人,把乡土记忆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短板,在基层尤为突出:公共活动多、在地内容少;热闹一阵多、沉淀留存少。方志所载的民俗风情、村史沿革,恰恰是“家门口的文化”。《志说衡阳·古韵衡州》影像志以现代影像语言系统梳理深厚的历史文化家底,转化为衡阳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坚实而生动的“视觉证言”,说明方志完全可以以“赠书展板”走向可感、可及、可传播的公共文化产品。

打通堵点:从“方志大省”到“方志强省”。湖湘方志资源转化已有探索,但“重修轻用”的惯性尚未根本扭转,存在三方面堵点。资源与产品“不通”,志书沉睡在库;内容与受众“不通”,旧志文言与大众阅读习惯之间存在鸿沟;部门与部门“不通”,史志系统与文旅、教育、数据等部门的协同尚未形成制度接口。破解这些堵点,需从存、用、传三个环节同步发力。

以数字化打通“存”的堵点。湖南数字方志馆已录入新编地方志668册、旧志101种,可检索文本4.7亿余字,基础平台已经成形。下一步的重点不在“继续扫描”,而在“结构化激活”:依托知识图谱将地名、物产、人物、灾异、职官等要素从线性文本中提取为可查询、

可关联、可调用的数据层,并与文旅规划、城乡建设的业务系统建立接口,使方志数据从“可检索”升级为“可调用”。

以产品化打通“用”的堵点。资政的生命在于“被用上”,而非“被看到”,建议聚焦乡村振兴、防灾减灾、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按“问题—史实—启示”的框架遴选代表性治理案例,编印《湖南方志资政通览》供决策参考;联合党校开设方志省情专题,让方志中的历史治理经验进入党员干部的知识视野和决策习惯。

以分众化打通“传”的堵点。面向决策与产业端,编制《方志新用: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指南》,将个案经验固化为可复制的操作规范;面向社会公众,持续推进“《志》说湖南”影像志等轻量化产品,积极在古城古镇和历史文化街区打造“志书里的场景”,使方志从阅读对象变为体验场景;面向青少年,推动方志文化进校园与研学实践结合,开发乡土校本课程,让思政教育可感可知。

盛世修文,志载三湘。湖湘方志的价值,最终不在于卷帙浩繁,而在于能否成为当代湖南人理解脚下土地、回答“何以湖南”的活的资源。以《习近平文化文选》为指引,把方志从“存史的文本”转化为“资政的智库、育人的读本、产业的素材”,才能真正为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不可替代的历史纵深。

(作者分别系湖南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作为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自我性认知和自觉性实践。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解读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归根结底要回答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三大哲学命题。

文化主体性的本体论:回答“我是谁”之问。从本体论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主要讨论存有本身,是对中华文明的本原或基质的探究。即从“我是谁”的追问开始,本质上是对“‘我’的根在哪里”的思考,并进一步展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什么”“为什么要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坚守什么样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等问题。

中华文明的根到底在哪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二卷指出要始终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更是强调“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华民族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产生了儒、道、法等各家学说,出现了汉赋、唐诗、宋词等伟大文艺作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其中很多重要元素,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究其本源,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华文明就是中华文化的现代形态,如从“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协和万邦”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传统中华文明经由“结合”之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因此,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植根于五千多年的文化沃土。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必须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

文化主体性的认识论:回答“我从哪里来”之问。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主要讨论存有来源形式,是对中华文明赓续发展过程中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认识与实践等相互关系的认识。即从“‘我’从哪里来”的追问开始,本质是探讨“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西方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什么不一样”等问题。

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进入近代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文明面临巨大的挑战,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古今之争”和“中西之辩”,“文化自负论”和“文化自卑论”等不绝于耳。但也正是在对“传统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追问与探索中,“我”的主体性意识日益觉醒,并最终实现中华文明的换羽新生,其密码就是“两个结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开启“本土化”进程。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传统中华文明发展方向引领、价值遵循和理论指导,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我”为什么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正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结合和契合。可以说,“结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得以复归和巩固的根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就是我们党坚持以“两个结合”坚守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论:回答“我到哪里去”之问。从实践论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主要讨论存有自觉自我的行为与活动,是对中华文明实现传统向现代跨越有效路径的阐释。即从“‘我’到哪里去”的追问开始,本质是对“‘我’怎样才能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思考,探讨“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境遇与挑战是什么”“怎样才能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等问题。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互相成就、彼此融通的内在逻辑联系,也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根本遵循。一方面,在实践的时代背景下,巩固文化主体性必须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土壤。另一方面,在实践的原则和要求上,巩固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科学的原则与方法,坚定文化自信,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对自身文化生命力持有坚定信心;秉持开放包容,处理好“古与今”“中和外”的关系,以贯通古今、融通中外、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坚持守正创新,从根本制度、根本要求、领导力量、文化主体性等方面守好正,从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等方面创好新。从而,以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作者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省社会科学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新论

科学把握文化主体性的哲学意蕴

马纯红